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MAKESIZHUYI YANJIUXILIE

SUOYOUQUAN YU ZHENGYI

所有权与正义

张文喜 著

走向马克思政治哲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MAKESIZHUYI YANJIUXILIE

SUOYOUQUAN YU ZHENGYI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所有权与正义——走向马克思政治哲学”（14AZX004）

所有权与正义

张文喜 著

走向马克思政治哲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所有权与正义:走向马克思政治哲学/张文喜著

·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7

ISBN 978-7-214-23745-3

I. ①所… II. ①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39385 号

书 名 所有权与正义:走向马克思政治哲学

著 者 张文喜
责任编辑 汪意云
责任监制 王列丹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3745-3
定 价 6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以往时代的某些政治单元(例如阶级)和界限随之徒有其名。传统的政治结构现状正在消除,地球正在变小,与此相应,今天国家之间的关系似乎正趋于道德化和法治化,各民族思想和情感似乎也趋于非政治化,以致有人错误地认为,在通往后历史的道路上已然预示了中国人是尚未富裕且正在快速变富的美国人。而美国人已经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最后阶段。今天,这在有些人中是正在被实实在在却又不乏天真地感觉到的。在这个巨大的变化过程中,如果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个危机,那么这是个政治哲学危机,亦即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危机。这是一个据说被西方政治上左翼和右翼广泛认同的观点。我们不禁要问:事情真是这样吗?毫无疑问,我们不能这么简单地看问题。首先,西方政治上左翼在隐退是事实,而且,它还处于其主题、方法和职能完全无法获得一致的状况之中。更为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有很大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和他们各自国家的历史和民族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而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历史中的发展,同各国实际的政治问题也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超然的纯粹学术思考。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要

原创性著述者(譬如列宁、毛泽东),很少有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相关工作的。他们的政治哲学思考产生于对具体问题的反思,其目标在于获得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诸方面的社会化基础。他们能够通过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继承、发展和延续下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战胜政治激进主义的原因。

首先,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马克思对“好的”社会界说为根据的。但“好”有许多因素,无论就社会或就个人来说,虽然有时难以名状。但从马克思的“好的”社会观点出发,我们需要厘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涵义,并区分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根据今天这个“后”(后革命、后理论、后现代主义等)时代的论点,这个区分或价值判断不再有必要。在今天流行的观念和言说方式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念首先被认为是最普世的观念,因为据说它们在东西方世界每个思考者看来必定都是一种价值。但一旦认可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严肃地产生疑问,因此也会发现它的自相矛盾。矛盾之一便是,只要出现价值,一种特殊的主体思考取向便不可避免,这是由价值思考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因此,如果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至于变成空洞表象的话,就需要有人使它们产生效用,即必须不断地被实现。就这一点而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认为各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已经非政治化了,这种说法是对历史本质的一种误解。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仅仅通过道德和法律这些局部完善促进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提高。因为我们不能把各种不同价值不可思议地扯在一起,似乎哲学一坐大,政治就被挤兑到一边,并因而可能把其他价值从已经取得支配地位的价值感情中排挤出去。

其次,“自由”这个概念在中华民族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体现在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际关系之中。中华民族的政治精神的所有可贵之处皆在于两者之间的和谐统一。我们必须说,“自由”这个概念在中华民族中曾经发生过特殊的概念错位,值得我们反思。当我们今天

在探究“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时看到，无论革命闹得如何天翻地覆，生活还要继续，人们要工作、要消费等等。但在今天我们不能由此引出消费主义的政治结论，即把追求增进安全、收入和名利作为公共生活的唯一目标，并将更高层次的价值弃之不顾。因为从政治上看，自由首先是一个公共秩序、伦理和内政的概念。在今天甚至小国小民也有自由和自决权的名义之下，世上却仍然有不少的国家不断打着内战。这一明摆着的事情足以表明，一个民族，如果不具有真正内在的自由，对自己负责，就不配享有外在自由，不配与其他民族一同谈论自由。因此，即使像美国那样的大国再怎么鼓吹自由民主，也是动辄得咎。比较而言，中华民族的自由概念始终是对内的，侧重于“内圣”层面，而从未流于“外王”层面或侧重于攫取以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奴役其他民族的畸形自由。凡有政治觉悟的民族，会尽力维护良知与行动、依赖与权力之间的和谐。当今天人类已经开始通过经济手段获得民主，为建立更高层次的成熟的社会治理体系而努力的时期要求下，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大国政治主张显然富有教益。对中华民族而言，这是事关文明还是野蛮的分界。

再次，来谈谈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我国构想民主制的有力支持。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的外延越来越大，包容了古老的古典民主理所当然地排除在外的群众。政治生活的参与在数量上日益扩大。这是民主的进步，但这不等于通过某种过去不及今则倍之的做法所达到的现状改变。因为“民主”这个词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在某一时期，例如抗战时期，就可能随着朋友和敌人的政治目的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我们把时刻变化的说法当成最后的依据，充其量是让支配世界流行舆论，例如美国的政治判断，牵着鼻子走。这样一来，即便尊重民主观念，大概也只会引出惟有“平等”趋向才叫民主的看法。这一贫乏的看法并非社会主义的，而是自由主义的。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因素系于视中华民族为完整的统一体。在这方面，19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家已经认识到。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对民主的如下结论：各种宪政形式相对于社会内容来说是次要的，具有不同民主形式的美国和普鲁士同样都建立

在私有财产的社会秩序上。照马克思的说法，真正的民主机构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机构”。根据当前我们时代的认识来看，今天缺少的不是观念，而是观念的诸多前提。因此，尊重民主观念既系于倡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更系于对于社会诸条件的创造。今天的反腐斗争乃是克服对于从经济和财政方面威胁着民主的危险之政治上的必然之举。从民主与财政的关系角度看，今天的状况一定是不公正的，因为纳税人必须批准并监督其使用这一古老信念没有得到维持，甚至对这种明明白白的经济上的责任的追究也惨遭破坏。如果我们要探讨社会主义公正问题，就有必要注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引发的社会不公的看法，因为在这个不公正本身中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必须研究其中的深刻原因。

面对这种情况，人们曾经沉酣于梦乡的失误和教训就很值得我们记取了。千头万绪，直击根底，我们渴望变革，希望不要变得更糟，希望能带来更好的东西。当然，这恰好是政治哲学本身予取予求的知识目标。对我而言，我完全同意哲学依赖于对现实政治的澄明。套用一句时下人们经常说的话来说，哲学家要给自己何所为即“为什么要哲学”这个问题一个说法。在此意义上，政治哲学乃是用来帮助我们审察某种更好或更糟的思想去从事政治、实现新的平等和正义。惟有这样，我们才能真切或同情地领会马克思哲学，领悟废黜私有财产权的共产主义教导。也正是此种考量，本书自命为“走向马克思政治哲学”。自从2004年发表《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解读》以来，我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就不曾停息。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学术研究》《江海学刊》等报刊上发表系列论文。若本书有些许重大发现，也是在历尽探索之后获得的。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篇 政治哲学的基本考察 1

第一章 复兴政治哲学 1

第二章 关于政治哲学的若干理解 14

第三章 政治哲学问题域及其建构 30

第四章 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嬗变 43

第五章 政治哲学概念性理解及进路 61

第二篇 作为政治哲学的马克思哲学 76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相 76

第七章 为马克思主义正名的一种应有视野 89

第八章 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108

第九章 马克思与政治哲学现代性的浪潮 116

第十章 开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新境界 130

第三篇 所有权以及无产者的政治哲学断想 150

第十一章 唯物史观语境中的正义理论之基本特征 151

第十二章 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所有权正义及其当代意义 165

第十三章	所有制与所有权正义：马克思与亚当·斯密问题	176
第十四章	马克思的所有权批判及其相关的公平正义观	192
第十五章	从犹太人问题的角度看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底色	223
第十六章	无产者形象之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断想	237
第四篇	思考正义的基本维度	255
第十七章	语言视角：马克思与古希腊人的正义观的哲学分析	256
第十八章	马克思对正义观的重新表达	266
第十九章	马克思的正义观述要	279
第二十章	马克思对“伦理的正义”概念的批判	293
第二十一章	论唯物史观语境中的法与正义	313
第二十二章	马克思“柏林法学建构”的意义	345
第二十三章	马克思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及其法的正义批判	362
第二十四章	马克思国家概念的遗产	375
第五篇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反观当代中国	393
第二十五章	社会主义平等观与当代中国	393
第二十六章	未来马克思政治哲学论纲	410
结束语	不能淡化危机意识	430

第一篇 政治哲学的基本考察

第一章 复兴政治哲学

面对持续的现代性危机,当今中国的政治哲学的反应敷衍塞责。今天看来,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败局的地方有其现实的根源。如果为政治哲学辩护,如果为政治哲学的历史尤其是未来提出富有洞察力的见解,那么必须清除关切什么是好的社会秩序上的思想障碍。任何科学只要不能在一切表面现象的背后寻得比较基本的要素,必然沦为经验主义。人的经验理性只能实现相对价值,但理想的、有实质的科学分析决不能通过放弃自身来保卫自身。这乃是当今政治哲学努力的方向。

由此来看,当前是一个重要时刻,我们社会生存的所有领域正在进行着一种价值转化。如果价值哲学与政治确有联系,如果我们所寻求的当代哲学确有一个政治哲学转向,则我们不可不关注中国和现代政治哲学转向的关系。因为今天,一方面理想的东西不再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理想又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时候,有必要谈论“什么是正确的”这一问题。

一、政治哲学的指向

近来备受争议的一种老生常谈的观点认为，政治哲学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这应该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就实际的观察而言，如果我们要彻底严肃地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很快会感到形形色色的价值主张的尖锐对立。从积极方面看，它能展示被统治的意识形态利用“逻各斯”资源以及表述自己思想和感情的能力；从消极方面看，即便重要的学术会议对政治哲学议题的称职的理论思考，思考者也只是陷入众多价值哲学的激烈交锋之中。在所有严肃的思考中，政治哲学似是而非地成了“坐立不安的哲学”，成了“会议哲学”。在此意义上，如今的政治哲学徒有其名。

能够最准确地总结出古今之争的说法，无疑是列奥·施特劳斯对自然权利和历史的解读。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信奉目的因，就其追问“什么是正确的”这一问题来说，感奋点在于从自然，即人、社会或事物的本质中推演出一系列对人的行为做出完备规定的规则，通过认真观察自然事实，以便找到社会问题之公正解决方案。此即自然法学说。此处的“自然”既可以指一般意义上之自然界，也可以指人性，即被赋予理性的人之天性。如果自然是上帝的造物，则内在于自然的规范（即自然法）便是上帝意志的表达，自然法学说也就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如果自然法是从被赋予理性的人的天性中推出，正义原则便被想象为可由理性发现，因此此原则正居于其中，自然法学说便披上了理性的外衣。显而易见，自然法学说凭借对某权威或神圣律法服从，人类生活才得以把握。哲学则依据自然的正确，盘根问底地追问“什么是正确的”，因此，在哲学看来，自然法学说从自然界推出或人的理性中找到最自相矛盾的正义原则。

然而，从历史上看，哲学家最容易冲撞法律，例如，苏格拉底没有同雅典的文化、社会或经济发生冲撞，而是在于与法律发生冲撞。现在的法律不过就是政治现实，但在那时有个好听的说法：法律乃神定之法。

这种历史现象我们需要多解释,但是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只要知道,政治常常向哲学家发动攻击,而哲学家为了生存,需要的不是人类学、社会学或经济学,而是政治哲学,为的是使这个世界对哲学更安全。为什么?一方面,哲人如果依据自然正确可以无保留地追问“什么是正确的”,就会冲撞政治秩序,甚至和神法过不去;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关注并服从政治共同体的法律、神或某权威。最终,哲学不是也不能在政治共同体里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意见之外解答“什么是正确的”这一问题,相反,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是为政治共同体所接受的一个答案。

要理解这两重说法的关联,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政治共同体而言为好的东西,对哲学而言未必为好的。这叫做理想不是现实。换一种说法是,哲学思考相当于思考理想观念,即诸如崇高、高尚、美及和谐的观念,它由此超出社会的政治的、道德习俗的、宗教的意见,这是因为后者本质性地不是从人类社会应该如何生活为出发点,而是从人类社会曾经如何生活为出发点的。

因此,这本身使人注意到哲学的两重任务,一方面哲学生活谋求政治上的辩护,另一方面,哲学的必要性在于建立最好的或者正义的秩序。就此而言,古典政治哲学几乎完全是为哲学服务的。而关于“什么是正确的”这一问题,是一个在政治领域给哲学提出的问题,它表明关于它的争执来自政治领域。因此,不需要太复杂的理由,政治哲学必须成为关于人类事务的第一哲学。它所引出的“我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是人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伦理学问题,实质上是政治哲学问题。不过,古代人看重理想^①,所以把关于人类事务的科学,即政治学看做伦理学的一部分。这个立场包含在由列奥·施特劳斯以柏拉图主义政治

^①“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页。

哲学研究为名所揭发的前现代政治哲学中。

而从今天的立场观之，对“什么是正确的”这一问题通常另有所问。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人所作所为决不会去想象天生(然)地“正确”。马克思在批评吉尔巴特的“自然正义”观点时说，“这是毫无意义的”。^①伯林甚至说，经过启蒙后，还谈上帝赐予的自然法，就有些神经不正常了。然而，上帝死后，现代人特别无助，特别需要探究有关人之行为的正确性无解的问题，这也是事实。

然而，谁或者什么地方会探究并提出这问题？我们发现，现代人认清这样的事实：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和利益，今天宗教和政治的狂热提供了尤其可怕的事例。因此，现代政治哲学对价值概念的篡夺，就用“为何要问什么是正确的？为何不问什么是不正确的”这个问题反过来表明把古典政治哲学关于最好的或者正义的秩序从相对正义中排挤出去的倾向。其论证可概述为：“理念的意义并不在于实现，而在于让人知道现实有多么糟糕，现实距离理想有多远。”^②

这表明，现代人认清现实之后，热衷于政治哲学，把政治哲学当作第一哲学，其立场却与古典政治哲学完全不同了，它已经顺从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以下我将考量这个明显对前现代政治哲学激进变更的立场。它与关于生活的真理问题相违背吗？或者说，现代政治哲学对前现代政治哲学激进变更有没有带来不利？

二、真相的浮现

什么叫政治哲学？我们前面已经作了初步界定。从批判观点来看，就算我们自己不想提出这个问题，当今时代也已经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如今在我们中间尝试表明什么叫政治哲学的说法，就有一大堆。并且，一种说法很快就能变成老生常谈，却不易变成实践上和合理意义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9页。

^②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的约定俗成。那么,我们能不能弄一个简单的、容易处理的定义,使得大家不必费多少口水就能达成一致呢?对此,当有不同的看法。譬如,对于伯林来说,他所关切的问题经过好几千年争论,尚未取得进展。由于民主观念及其现代哲学的怂恿,不管谁想如何弄清楚这个问题,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永恒的交谈和毫无成果的喋喋不休。“政治哲学的全部,仿佛就在于解释民主的‘无政府’状态,然后抑制它。”^①可是,施特劳斯则几句话就打发了。为什么?这是因为,对于一个思考政治哲学问题的人来讲,他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关于“什么是正确的”并未找到答案,“价值”一词以特定的现代内涵也必然预设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若是不能用新的更完善的价值理论来支持新的政治应用,为革新所作的任何新的努力都不能为新的政治应用打下充实的基础。如今连 10 岁的小孩都知道价值是相对的,但他也知道如何绝对避免大错。

哲学的思考正是意味着这类思考。伟大思想家所专注的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例如,统治世界的规则是什么?世界由什么构成?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等等。这些问题看上去要比其他问题更难回答。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能从事实里寻找它们的答案。任何一个有些见识的人都能告诉你“鸦片是毒品”,或者告诉你“鸦片为什么让人睡觉”。而对于其最基本问题的关切,譬如,为什么有些人要吸食鸦片?答案可能极难发现。因为,前者乃是可藉实验检验的事实判断,后者涉及无法验证的价值判断,即对“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的关切。政治哲学有能力担当如此追问吗?政治哲学,以及 19 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科学和当前的伦理学转向,在许多人看来都倒错了:都是要实现哲学去压制政治。

那么,问题在于,哲学为什么一直劳什子地要跟人类不知道答案,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寻求答案的这些问题打交道?什么是人类不仅不知道答案,甚至不知道如何去解答的问题?为什么这种问题就是跟政治哲学

^① 雅克·朗西埃:《对民主之恨》,李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6页。

有关系？所有这些问题实质归结为两个问题：什么叫政治哲学？哲学与政治有什么关系？我们发现，由于政治哲学的边界的模糊不清，流行着许多建立人为界线的学院派定义。可是，政治哲学不是一个学院里头存在的东西，多数伟大政治哲学家都不是大学教授。当你开始从学院派谈论政治哲学时，就可能相对忽略那些真正的政治哲学问题。柏拉图要将自己的理念实现到城邦中，实现之时，就是政治停摆之时。同样道理，将政治哲学理解为哲学本身之外的东西亦欠正确。列奥·施特劳斯、以赛亚·伯林、葛兰西^①在回答“什么叫政治哲学”这一个问题时断言，所谓哲学就是政治哲学。

当然，这种看法让人困惑，这里有些颇为微妙的理解。从现代政治哲学立场观之，政治和哲学的共同之处太少，哲人对政治事物的蔑视或者怠慢由来已久，将政治和哲学捏在一起成为政治哲学当然不可能。那么，为什么政治哲学就是哲学本身呢？列奥·施特劳斯、以赛亚·伯林、葛兰西，他们有不同的理由。首先要说明的一个要点在于：对于列奥·施特劳斯来说，哲学本质上就是政治的，它的含义是：哲学要关切人类价值冲突这件事情，让大家来寻得统一性的基础，至于最终能不能解决价值冲突是另一回事。为什么要哲学？哲学有什么用？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政治”一词也须在如何回答“为什么要哲学”这一问题的意义上使用。换言之，政治不是制造纷乱，而是坚定信心。对于伯林来说，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它的含义是：政治哲学是帮助人们寻找异议，以求得政治的回归。因而，人类不可能避免价值评价这回事。价值冲突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它是无法解决的。甚至大家争论了半天，也不知道这共同事物或共同善原本只是一小撮人所谓的善。伯林理解的所谓价值冲

^① 葛兰西说：“‘哲学和政治’、思想和行动的平等或相等，也就是说，达到实践哲学。一切都是政治，甚至哲学或各种各样的哲学……也是如此，而唯一的‘哲学’则是行动中的历史，也就是说，是生活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解释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这一命题，也由此人们可以断言，伊里奇[列宁]开展的领导权的理论化和现实化，也是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事件。”参见葛兰西《狱中杂记》，曹雷雨、姜丽、张旸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不过，葛兰西最终把哲学定位为意识形态。

突无法解决等于说对于政治主张来说，“没有绝对基础无法活，有绝对基础也无法活”。^① 对于葛兰西来说，哲学本质上是政治，它的含义是：一切都是政治。哲学要政治起来。可见，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同意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其实理解很不一样。

我们不妨以如下方式设想，它们之间有共同点和不同点。设想哲学家正在议会里作为观察员列席。他发现，议会是这样—一个地方，人类中分布不均等的理性微粒在这里聚合起来，但对于议会而言，和政治本身的情况—样，观念的自由竞争意味着没有绝对正确的结论，只有平衡、妥协的意见。除了辩论之外，在议会内部仅仅获得相对真理，这是议会制度的—个特点。同样道理，对于政治而言，通过党派的对立而达成的意见平衡，就像人通过饮食平衡获得健康—样重要。但是，它绝不能扩展到世界观的绝对问题上，政治里面只能解决性质上是相对的真理问题。同样可以说，搞哲学也就要辩论，有异议，才要意见交流。目的是通过论证某事情为真理或正确而说服对手，或被人说服而认为某事情正确或正当。从现代哲学立场看，哲学的特点在于各方的意见冲突、平衡。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持平之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哲学是来自各种肯定和否定的永无止境地向着新的综合的意识的自我发展。按照黑格尔哲学就无法为善恶的绝对区分提供基础。善就是在辩证过程中的当前状态中合理的东西，所以也是现实的东西。如果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那么它就是一个拿不出最后证据、没有明确的终审判决的过程。

从哲学与政治的这种勾连来说，以议会制原理为基础的现代政治理论与现代哲学理性主义有种种关系，它们共同信奉历史相对主义。它们获得的简单结论是，人类的—价值冲突无法解决，这在议会制与政党的政治生活舞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这一点甚至希特勒都清楚。他指出：“很多人说理性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还必须考虑到其他无法解释的事

^① Leo Strauss,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Thomas L. Pangl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 16.

物。我认为最后落脚点但凡不以理性为基础，就不会有任何价值。在政治才能方面，我认为任何不以理性为根基的观点都是不对的……”^①这靠近伯林的观点。伯林从好争论和好斗的人性中，看到了“关于寻找行为问题之答案的正确方向的分歧”，人类没有办法找到绝对基础来解决分歧。但从知识的角度看，所谓“真正的知识都是描述性的：其正确性取决于同客观存在的‘事实’的一致。只有知识能够完全消除无知和怀疑”。^②大致说来，这是一种把政治问题看做经验理性范围里面的问题。对于伯林来说，如果政治问题确实是问题的话，那么“它们的答案通过专门用于它们的发现技术就能找到”。^③这里，伯林避开了价值冲突，实际上也就等于狡猾地消解了真正的政治问题，虽然它最初是以一种反抗绝对价值观念的要求出现。伯林自以为是地认为取消绝对价值观念，历史相对主义便成了一剂治疗政治疾病的灵丹妙药。

然而，价值冲突问题毕竟不能等同于一场口水战。对于施特劳斯来说，要使政治和哲学争论成为可能，要有某种绝对的立场。相对主义看来需要某种绝对主义，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我们并不能像伯林那样认为，对手之间只要共同承认某个客观事实就行了，而是要承认价值冲突的不可避免，并寻求一个唯一并且高高在上的东西，以便获得一个统一体。

因为无论如何搞哲学还是搞议会政治，辩论需要以共同信念为前提，需要有被人说服的条件，需要真正能够讲理的条件，需要有高于党派关系和私利的东西。否则社会崇尚的东西（比如民主）与这个社会有机体的首要和关键部分之间必然失去和谐。政治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理”，议员之间发生肢体冲突恐怕也无法恰当地解决。从古典政治哲学的立场看，使哲人看不惯的是，议会里搞什么战术，除了动武，还有讨论法案时咬文嚼字，等等。这全套东西甚至表明了整个民族没有信念，我们总

① 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刘曦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② 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王崇兴、张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③ 参见上书，第28页。